

国庆庆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机制

罗月佳 保 虎

摘要: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支撑下,国庆庆典通过内外作用机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载体之一。从外部作用机制来看,国庆庆典以流程组织民众,以仪式规范行为,以情境渲染氛围,以榜样带头示范,以重复巩固秩序;从内部作用机制来看,国庆庆典以“大一统”的文化心理为基础,实现思维统合,唤起情感共鸣,完成价值整合,树立人格导向。最终内外作用机制在互动融通的过程中强化各族民众的“五个认同”,建构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格局,形成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关键词: 国庆庆典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凝聚力

DOI:10.13501/j.cnki.42-1328/c.2023.02.0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程及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研究”(22VSZ065);四川省社科联、四川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跨喜马拉雅研究中心2022年度研究项目“现当代东南亚华人国家认同转变及其影响研究”(KX2022C01)。

作者简介: 罗月佳,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保虎,昆明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通信作者。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凝心聚力的问题,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①,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心聚力。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内涵在于增强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伟大祖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在于建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家庭格局,在于促进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而中国国庆庆典作为以民族国家为纪念对象的大型政治仪式,群众参与广泛,历史悠久,不仅承载了诸多社会记忆,还反映了国家历史、民族文化和价值追求,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载体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次国庆庆典都以政治象征和政治符号的具象化组合图景呈现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不仅使得国庆政治仪式饱含民众的个人情感,更使其成为党和国家向民众传递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国国庆庆典以国内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3版。

各族各界群众和海外中华儿女为主要受众,这些受众中的部分代表直接参与国庆庆典的系列活动,多数群众则以电视、网络直播、广播以及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为介质间接参与庆典情境。那么,国庆庆典究竟是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呢?本文拟深入考察中国国庆庆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外作用机制,以期为新时代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国庆庆典之所以能够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方式之一,首先同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以及文化底蕴有着密切联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二者辩证统一。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述:“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①中国国庆庆典尤其是“逢五逢十”周年举行的大型国庆庆祝活动是党和国家乃至民众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影响着民众的思想观念乃至言行举止,但国庆庆典这一政治仪式归根结底属于上层建筑,这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具体说来,国庆庆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有三:第一,中国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和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为其奠定了经济基础;第二,中国民主集中制原则所建构的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及政治权威则为其提供了政治前提;第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礼乐”文明、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则是其主要文化根基。由此,在上述社会基础的支撑下,内外作用机制互动融通,共同建构了一个闭环系统,使得国庆庆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可能。

一、国庆庆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部作用机制

外部作用机制是国庆庆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前提。首先,中国国庆庆典通过国家政治权威实现社会动员,将不同民族、阶层、职业、党派和地域的国民纳入共同关注的公共政治仪式活动之中。其次,主办者按照国庆庆典流程将国民组织化,并形成稳定有序的仪式秩序,使得国民在仪式的规范中各就其位,各安其职,并在渲染的情境中达成共识,形成默契,一起知晓、接受并认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再次,全国各族各界民众通过国庆庆典所塑造的榜样示范不断培育和践行主流价值观。最后,国庆庆典仪式通过“逢五逢十”的重复操演进一步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唤醒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以此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外部作用机制。

(一)以流程组织民众

中国国庆庆典有着一整套系统化的流程,这些流程将各族各界民众乃至海内外中华儿女纳入其中,并按一定的秩序组织起来。国庆节日的确立是国庆庆典组织民众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节作为一个特定的时间和节日并非与共和国一同诞生,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步明确的过程。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接受了全国政协的建议案,决定“自1950年起,以每年的10月1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②。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便确定下来沿用至今,并在每年的国庆节举行或大或小的仪式庆典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有着一套相对稳定的程序,尤其是“逢五逢十”的大型国家级国庆庆典活动,流程大多相似。其基本流程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鸣放礼炮—升旗仪式—国家领导人发表国庆讲话—阅兵仪式—群众游行这六个环节。首先,国庆庆典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作为隆重开场,这一环节将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普通民众共置于相同的时空之中,不仅拉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

^②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人民日报》1949年12月5日,第1版。

了二者之间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而且表现出国庆庆典的全国性和庄严性。其次,鸣放礼炮以营造庄严肃穆的氛围。此后,在神圣的升旗仪式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所有参与民众均注视着国旗升起并唱国歌,在气氛的烘托下,参与者对中华民族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而后是国家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国家主席作为国家权力和政治的象征,他的讲话显示了国庆庆典活动的重要性。同时,国家主席的讲话通常会回顾中华民族发展历程中的成就与挫折,并阐述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再次重申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和前进路线,以达政治动员和社会统合之效。在盛大的阅兵仪式中,中央军委主席乘车检阅部队,并同受阅部队进行语言互动。检阅结束后,各受阅方阵和队伍依次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喊着整齐的口号走过天安门,并配以豪迈雄壮的军乐。庄严肃穆、整齐划一的阅兵仪式不仅展现了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的团结统一,更彰显了中国军威,对内树立了广大民众对中国国防能力的自信,对外宣扬了中国军队的强大和武器装备的精良。阅兵仪式结束后便是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数以万计的各族各界民众被组织起来,游行队伍和彩车方阵以行业发展成就、时间变化或时代主题为线索依次通过天安门。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要观礼嘉宾均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群众游行,并与游行群众挥手互动。居于较高地理位置的领导人同游行群众之间形成一种高低错位的空间,彰显国家的政治权威和群众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认同。尤为重要的是,群众游行环节还营造出喜庆欢快的氛围,在展示各行各业发展成就的同时描绘出一幅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民同乐的图景,表现了全国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认同与热爱。

国庆庆典系统完整的流程不仅将民众按照特定的秩序组织起来,更搭建了国家和民众个人之间的公共活动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中,一切民族、阶层、职业、党派之间的差别暂时消失,所有人都参与大家共同关注的国庆庆祝活动中去,最大范围地实现了各族民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集体欢腾”中密切了各族各界民众之间的关系。同时,国庆庆典的所有直接参与者均接受组织者的统一指挥,采取事先拟定的行动,这不仅彰显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有效性与合法性,还在此过程中传递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强化了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感,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二) 以仪式规范行为

中国国庆庆典是国家与民众沟通的有效媒介之一,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民众个人观念之间搭建了双向互动的空间和场所。在国庆庆典的系列活动中,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民众个人的观念发生碰撞交流和共振,最终达成一致,形成共识,在此过程中,实现了社会行为规范的传递,使得民众知晓什么样的公民才称得上是中国的国民,以此规范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言行举止,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

社会中既有的“知识”通常能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同和共同遵守,而身体的在场是人们产生认识的前提和基础,外界通过身体作用于人的心理则是民众情感和认知生发的关键。“仪式行动通过以身体的方式重新制定意义与语言的根源联系在一起,如果不以身体方式的话,意义就会失去它们体现的所指意义。”^①中国历次国庆庆典也可以看作是各族民众直接或间接参与的身体经历。国庆庆典以系列庆祝活动的身体经历告诉民众,他们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分子,他们同全体民众一道,是共生死、共荣辱的命运共同体,他们应当热爱自己生活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他们的行为应当符合共同体的行为规范。

社会调节是实现社会规范的重要一环,从一定意义上说,国庆庆典也是有效的社会调节手段之一。中国国庆庆典这一大型政治仪式,通过强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高大形象来整合民众,凝聚共

^① 安德鲁·斯特拉桑:《身体思想》,王业伟、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识,成为联结国家与个人的有效媒介。正如南希·芒恩所述,仪式“通过共同生活意义的象征性动员,将个人与有着重要人物的共同体联系在一起”^①。国庆庆典亦是如此,它通过系列象征符号,展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等方面建设的辉煌成就,不断强化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的伟岸形象,让民众以身为其中的一员而自豪,并动员民众继续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心聚力。

(三)以情境渲染氛围

国庆庆典不但运用庆典流程组织民众,借助仪式活动传递社会规范,而且还通过渲染情境来营造氛围,形成各族民众间的相互关注以及专注的情感共享机制。国庆庆典系列仪式活动营造的氛围感染着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的每一位民众,所有参与者同处于一种情感状态下,这在无形中密切了民众之间的社会联系和促进了民众的凝聚和团结。正如兰尔德·柯林斯所述,仪式对于保持社会团结具有积极作用,“仪式是连带性的;它们对整合施加压力,从而突出一个人是社会的成员”^②。同样,国庆庆典仪式的系列情境亦会让参与其中的各族民众切身感受到自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整体中的一员,从而增强各族民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国家是不可见的,它必被人格化方可见到,必被象征化方能被热爱,必被想象才能被接受。”^③因此,国庆庆典也总是通过物化形态和象征符号来呈现国家和中华民族。国庆庆典中的国徽、国旗、国歌、礼炮、天安门城楼、人民英雄纪念碑、领导人挂像、阅兵典礼、群众游行等元素共同构成了丰富的情境符号,传递着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国庆庆典主要建构了国家领导人、国旗国歌、部队官兵和武器、群众游行方阵这几个情境焦点,无论是在现场直接参与还是通过大众媒体间接参与国庆庆典的各族民众都被卷入了这些国家政治象征之中。此时,各族民众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都统合于国庆庆典渲染的情境之中,这使得各族民众在日常的交往中新增了国庆庆典这一共同话题,这一共同话题对于密切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社会联系和唤起情感共鸣具有正向价值。

国庆庆典情境的特征之一便是民众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共处庆祝活动的情景之中。无论民众是直接参与庆祝活动还是通过大众媒体间接参与庆祝活动,这都需要民众将自己的身体置于真实或虚拟的庆祝情境中去,切身感受到自己身处其中,并不可避免地同活动中的其他参与者互动交流,从而明确自我归属于某一个群体,由此产生归属感。无论从时间还是从空间来看,国庆庆典均不同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具有非常态性和历史性,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庆庆典甚至具有不同的主题和政治目标。在国庆庆典中,民众通过直接或间接在场的方式,共同享有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并通过定期和多次举办国庆庆典再生产民众的文化认同。国庆记忆空间中的天安门城楼、毛主席画像、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等是承载民众记忆的重要载体,能够唤起民众对历史的回忆,使得民众将过去同现在有机联系起来,并指向未来。国庆庆典的情境总体上营造出一个中华民族革命、建设乃至生活的共同体,把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共同集聚在国庆庆典的时空中,通过唤起民众共有的历史记忆,来整合民众的现实心理,从而建构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国庆庆典中,直接或间接参与其中的各族民众不仅会认识到自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分子,并且会意识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先在性,即它不以各族民众的意志为转移,它在各族民众存在之前就就业已存在。如此,国庆庆典便沟通了中华民族的去、现在与未来,彰显出中华民族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进而强化各族民众对中华民族的文化

① 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3页。

②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8页。

③ 转引自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43页。

认同。

(四)以榜样带头示范

国庆庆典是一种典型的榜样示范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次国庆庆典不仅对已故先烈们表示缅怀,还对健在的英雄人物、劳动模范和民族团结优秀代表等先进分子进行褒扬。这些榜样人物无一例外都具有高尚的人格,都愿意为国家 and 民族利益舍生取义,都愿意为国家建设和民族团结事业牺牲奉献。他们在国庆庆典中的出现和地位的凸显旨在将道德榜样以更加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各族民众,为各族民众提供可资模仿的现实对象,从而引导各族民众行为的发展方向。

榜样通常以其高尚的品德和英雄的事迹为人称道。从历次国庆庆典凸显的英雄模范群体来看,他们大多都是对后世或当今时代有着卓越功勋并令人敬佩的代表人物。如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庆典上,仪仗队之后的第一个方阵便是由21辆礼宾车组成的致敬方阵,车上均为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家属、老一辈建设者及其亲属、老战士和老英模等代表。这一仪式安排彰显了党和国家对革命先辈的缅怀,对英雄模范群体的肯定和对民族历史的尊重。此外,在当代为国家 and 民族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人物也在历次国庆庆典中得到凸显。如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和奖章获得者代表、卫国戍边英模、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获得者、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民族团结优秀代表等。他们都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为党和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既普通又伟大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是维护国家和集体利益、荣誉的先进分子。国庆庆典对上述先进代表群体的突出,旨在向各族民众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正能量,增强各族民众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同感,最终引导各族民众将对英雄模范等先进分子的崇拜之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五)以重复巩固秩序

重复是将人们的行为培养成习惯的有效方式。中国国庆庆典是在固定的时间,即大多是“逢五逢十”周年的10月1日进行的一项政治仪式,国庆庆典通过天安门广场几乎相同的空间布景和重复的仪式流程来巩固已有的社会秩序,强化国家与民众之间的联系,增强各族民众个人对群体和民族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重复的国庆庆典活动具有同一性、持续性和稳定性,在重复达到一定次数后,就能固化参与者的行为。正如列宁所述,“人的实践经过亿万次的重复,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式固定下来。这些式正是(而是只是)由于亿万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①。国庆庆典亦是如此,在经过多次重复上演之后,便成为民众心中固定的“公理”,成为一种习惯范式。同样,国庆政治仪式不仅每次都在循环的时空举行,而且每次都按照大致相似的流程进行重复,还都有着固定的政治象征符号,伴随着历次国庆庆典仪式的重复操演,强化了民众的国家观念,增强了各族民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感,从而巩固了已有的社会秩序。

国庆庆典仪式在重复多次后,民众亦会形成稳定的习惯。正如布迪厄所述,“每一群体都会把对于它来讲最基本的原则和对于它的保留最不可或缺的东西托付给身体的自动机制”^②。同样,重复的国庆庆典操演亦会建构民众稳定的身体行动机制,让民众将国庆庆典传递的行为规范转化为一种习惯。这不仅提高了民众的规范性意识,更增强了民众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联系,提升了民众的集体感、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巩固了已有的社会秩序。

^① 《列宁全集》(第55卷 哲学笔记 1895—1916年 第2版 增订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6页。

^② 转引自安德鲁·斯特拉桑:《身体思想》,王业伟、赵国新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39页。

二、国庆庆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部作用机制

虽然中国国庆庆典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各组成部分的外部整合力非常强,但相较于外部作用机制,内部作用机制才是个体思想与行为形成更为根本的原因。个体内在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情感意志、价值观念和人格范式等主观因素是国庆政治仪式内部作用机制的重要因素。国庆庆典在契合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上,通过系列象征符号实现思维统合,在塑造的诸多情境中唤起情感共鸣,在协调各类关系中凝聚价值共识,在褒扬劳模英模等先进代表中树立人格导向,以此形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部作用机制。

(一) 契合文化心理

文化心理是个人内在的心理基底,它深刻影响着个体的思维、情感乃至行为。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历经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逐步得以形成、发展和巩固。因此,无论是中国古代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一统”意识还是近代救亡图存时期与外夷相对的“中华民族”意识,均构成了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心理基础。

中华民族政治文化上的“大一统”思想贯穿古今。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的观念。秦统一六国后,更是实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②等政策。此后,政治和文化上的统一不断得到加强,这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政治文化上的统一,不仅维护了王朝的稳定,更使得这种统一成为一种常态而为民众所认同。鸦片战争使得中华民族经历了从“自在”转向“自觉”的过程。及至1911年,“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国各族人民从族类、王朝认同到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根本转变”^③。此后,在抗日战争这一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让民众逐步感受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更是获得了政治国家的外在形式,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得到前所未有的增强,民众的文化心理也日趋统一。新时代,党和国家更是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主线。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大一统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心理,民众亦将团结统一作为一种常态加以认同。因此,在大一统的历史文化心理基础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次国庆庆典通过系列象征着团结统一的符号和仪式活动,渲染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奋力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氛围,让各族民众真切感受到他们是多元一体、命运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一员。

(二) 实现思维统合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个体记忆离不开集体记忆,不存在独立于集体记忆之外的个体记忆。正如哈布瓦赫所述,人们只有在社会中才能获得他们的个体记忆,“也正是在社会中,他们才能进行回忆、识别和对记忆加以定位”^④。每个个体的记忆虽然只关涉一个主体,但仍然留下了深刻且持久的记忆,这使得个体与来自社会环境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联系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次国庆庆典也是通过集体表象来呈现社会历史记忆的。在国庆庆典仪式中,

① 陈节注译:《诗经》,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年,第312页。

② 子思撰、李春尧译注:《中庸译注》,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第86页。

③ 罗福惠:《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演进》,《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第15-20页。

④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8-69页。

国旗等器物、参与者的着装、活动中的口号语言、标语横幅文字、红色背景音乐等系列象征符号共同组成了一幅情景交融的意象图景,这些符号对于塑造民众的认知具有重要作用。而意象同表征一起,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表征在人们的头脑中建构了一个抽象的符号世界,当实体缺席时,这一符号便代表着实物。由此,人们会按照一定的逻辑将周围的实体或信息表达清楚,形成系统,最终构筑一个概念化的理论世界。尤为重要的是,思维方式不仅具有个体性更具有社会性。社会性的思维方式先于个体思维而存在,并成为个体思维的底色,“自觉或不自觉支配着与制约着个体的思维活动”^①。同样,国庆庆典亦通过整合集体思维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国庆庆典主要通过一系列意象组合、政治象征符号和文字表征,来整合各族民众的思维。“中华民族是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多元一体的有机整体”等观念,都能在国庆庆典仪式中直接或间接通过大众媒体传递给各族民众,各族民众在多次直接或间接参与国庆庆典的过程中会不断强化这种认知,并在此后的现实生活中得到证实。民众个体在国庆庆典仪式的系列意会情境中,不仅会自动觉察到应当热爱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应当团结一致,并且还能意识到应当如何去爱护和建设自己的国家,应当如何去更好地团结各族人民,从而实现对个体思维的统合,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全体国民的集体意识。

(三)唤起情感共鸣

共通的情感是采取共同行动的前提和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次国庆庆典通过营造一种严肃庄重而不失喜庆的氛围,使得参与者能够暂时将其他杂念抛在一边,专注于当下的情境,唤起情感上的共鸣。例如,在国庆庆典的升旗仪式中,“当一个群体的各成员看着国旗升起并一起唱国歌时,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些事物上,并知道别人同样是这样,这时他们会感到自己在见证一种比他们中任何一个人人都伟大的原则或力量——国家”^②。在这一仪式过程中,各族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便油然而生。

情感既是一种个体内在的凝结剂,同时又是一种与他人共享的机制。在中国国庆庆典仪式的各个场景中,并没有人明确教导大家要庄严肃穆而又不失欢快,但参与者无不自然而然地表现出端庄的神情和喜悦的心情。正如涂尔干所述,当布道者在号召人们的信仰时,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信条的逻辑论证上,而是“通过定期举行膜拜仪式来唤起并不断唤起人们的情感,以获得精神上的惬意”^③。这种心理上的有益倾向相较于理论论证更有助于建立信仰。同处于国庆庆典情境之中的各族民众,也会共享彼此的情感,在共同的身体经历中,唤起情感上的共鸣,实现各族民众与民族、国家以及政党之间的多维情感互动。从民众个体的角度来看,国庆庆典中较为突出的情感便是各族民众对国家的热爱之情,对党的感激之情,对中华民族的自豪之情,以及对英雄模范的崇拜之情;从党和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庆庆典中较为突出的情感则是党和国家对历史的珍视之情,对人民的尊重之情。由此在各族民众同党和国家情感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引起共鸣,强化了各族人民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华民族的热爱。

(四)凝聚价值共识

价值是较为稳定的内部整合力量,价值观一旦被凝聚达成共识,便能实现社会整合。中华民族也正是通过共有的价值观将各族民众团结统一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仪式是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价值共识、实现价值整合的有效方式。

① 高晨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② 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学思想述评》,李霞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第164页。

③ 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敬东、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97页。

国庆庆典仪式是调节社会关系、实现价值整合的重要方式之一。正如有学者指出,“借纪念活动协调党际关系、整合各派力量、凝聚各方人心,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纪念活动的着眼点”^①。国庆庆典作为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中的一种,同样具有价值整合功能。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次国庆庆典参与群体非常广泛,除了有诸多共产党员外,各民主党派成员也积极参与其中,他们或参加现场庆典仪式,或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花篮,或召开民主党派国庆座谈会。在国庆庆典上,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会对民主党派表达谢意和敬意,民主党派则会对中国共产党表示支持和拥护,最终在党际交流互动中和谐政党关系。其次,各少数民族也会参加历年的国庆庆典。党和国家不仅组织了专门的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还让各族民众参与群众游行方阵和阅兵仪式,并且还多次专门召开少数民族代表同国家领导人的见面会。这就有利于加强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并进一步融洽民族关系。再次,华人华侨和海外中华儿女也是国庆庆典的重要参与者,他们积极融入国庆庆典的诸多环节,见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成就,这对于密切海内外同胞关系具有积极作用。国庆庆典通过对上述各类社会关系的协调,使得各族各界民众达成价值共识,进一步增强各族各界民众对中华民族、伟大祖国的归属感,对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国庆庆典还是传递时代主流价值观的重要载体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次国庆庆典仪式不仅告诉民众应当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以及如何落实到行动中,并且还告诉各族民众应当以什么样的标准作为中华儿女的行为规范,应当用什么样的尺度去评价国家和民族的大事。国庆庆典通过系列情境向各族民众传递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各族民众的言行举止要符合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要以集体和全局利益为重,从而凝聚价值共识,增强各族民众的国家认同,巩固各族民众的团结统一。

(五) 树立人格导向

英雄劳动模范和民族团结优秀分子等先进代表是中国国庆庆典推崇的榜样人格,他们大多拥有舍生取义的高尚品德,并且都能以集体和全局利益为重,甚至能为了他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作为国庆庆典推崇的英雄劳动模范和民族团结优秀代表,其意义并非仅限于个体,而是指向全国各族民众乃至海内外中华儿女。那么,英雄劳动模范型人格如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呢?除了专门的英雄劳动模范事迹学习报告会、学校教育以及大众媒体宣传这三大主要传播途径外,在国庆庆典仪式中进行展示则能够起到更为广泛的宣传学习效果。国庆庆典通过反复的仪式操演,宣扬不同历史时期英雄劳动模范和民族团结优秀代表的榜样人格,并引导各族民众在实践中去体悟和践行这些高尚的道德。相较于其他培育方式,国庆庆典中的人格范式整合则更具广泛性和崇高性,是中国社会意识形态整合的重要方式之一。

国庆庆典中的英雄劳动模范和民族团结优秀代表不仅是中华儿女中的一员,更是时代主流价值观的践行者和传播者。他们的言行举止不仅符合党和国家以及社会的基本要求,甚至在此基础上具备更加高尚的人格。如在国庆庆典上曾突出强调过的全国劳动模范和解放军英雄模范以及民族团结优秀代表等先进分子,他们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着爱国主义情感,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以其高尚的品格为民众提供可供效仿的榜样。国庆庆典以先进代表的人格为导向,为中华各族儿女指明了人格发展方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榜样人格范式。

^① 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页。

三、结语

中国国庆庆典以其独特的内部和外部作用机制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载体之一。国庆庆典的内外作用机制并非割裂的,而是有机统一、相辅相成的,二者在互动融通中形成的闭环系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一种路径。国庆庆典以“大一统”的历史文化心理为基础,通过系统化的流程将民众有序组织起来,而后通过情境的意象化组合和具象化符号来渲染气氛,唤起各族民众的情感共鸣,凝聚起价值共识,实现思维统合,进而强化各族民众的“五个认同”,并在实践中为各族民众树立人格导向,规范民众行为。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整合方式,它以民族国家为纪念对象,将国家意志和个人愿望有机结合,促进了各民族、党派、阶层以及地域之间的交往、交流与融合,增强了各族民众的国家认同,凝聚了社会共识,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但是,国庆庆典仅仅是众多国家级大型政治纪念仪式中的一种,在此后的意识形态工作中,党和国家“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①。要进一步发挥大型政治纪念仪式的政治动员、社会组织、关系调节和价值整合功能,借助仪式庆典活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The Function Mechanism of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in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LUO Yuejia BAO Hu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emphasized that the cause of national unity and progress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with the main line of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upported by China'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foundation,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effective carriers to consolidate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rough internal and external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mechanism,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has organized the people by process, standardized the behavior by ceremony, created the atmosphere by situation, demonstrated by examples, and consolidated the order by repet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 mechanism,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is based on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great unity”, real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inking, arousing emotional resonance, achieving value integration, and establishing personality orientation. Finall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mechanisms have strengthened the “five identities” of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and integration, built a pluralistic and integrated patter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big family, formed an interdependent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thus consolidat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cohesive force

责任编辑:陈沛照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65页。